

中国与非洲相距遥远,双方民间交往源远流长,非洲人民对中国怀有天然的亲近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非洲友好合作快速发展,伴随坦赞铁路、毛里塔尼亚友谊港等中国援非项目的建设实施,非洲人民心中的中国形象愈加清晰。如今,中非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内心情感的重要呈现,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塑造成为中非读者探悉相互认知的窗口。

古代友好交流中的文明互鉴

早在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就沿古代丝绸之路在华夏大地开启了探索之旅。他的中国之行,沟通了中国与非洲、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民安物阜的中国不仅有着精美的瓷器、五彩的丝绸、琳琅满目的金银器皿,多元文化相融相生下的中国城市更令人心驰神往。

在伊本·白图泰笔下,泉州“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园中央”;广州“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瓷器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在杭州,他发现中国的竹器、漆器制作极为精巧,而丝绸和瓷器更堪称一绝。伊本·白图泰还对当时中国的穆斯林生活做了详细考察,为研究中国的宗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本包罗万象的东方游记,增添了非洲人民对中国的瑰丽想象,为中国盛景的广为流传贡献了重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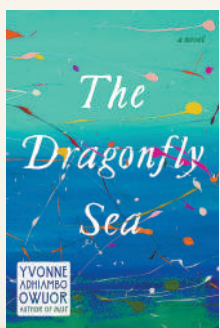
15世纪,中国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不仅加深了中国与非洲的民间交往,更令东非地区民众通过现实互动了解到真实的中国。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说,“中国”存在于他从小到大所耳闻的传说中:“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捡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一些故事里,中国人没有随舰队离开,而是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拉穆群岛位于肯尼亚东北部,是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之一。近年来,岛上出土了大量中国古陶器和瓷器碎片,勾勒出历史悠久的中非友好交往图景。2019年,肯尼亚作家伊冯·阿蒂安波·欧沃尔以这段故事为依托创作的长篇小说《蜻蜓海》出版。小说主人公艾雅娜身为华裔,这一灵感正来自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郑和船队中的一艘船遭遇海难,幸存的水手与当地女人结婚,繁衍生息。在赴华留学途中,艾雅娜邂逅了中国船长赖金,克服重重磨难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提及历史上的民

非洲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李春光



伊冯·阿蒂安波·欧沃尔《蜻蜓海》

间交往,中非人民都会因共有的情感、共享的故事侃侃而谈,不以万里为远。绵延不绝的民间交往美谈,拉开中非文化交流的序幕,更跨越时间,将亲切、友好的中国形象印刻在非洲作家的记忆深处。

现代民族独立浪潮里的相互支持

20世纪中叶,随着全球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中国与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彼



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

此的坚定支持。受到1955年万隆会议鼓舞,亚非作家协会等多边文学交流机构应运而生,推动了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在文学领域的互学互鉴,也鼓舞着拉丁美洲等地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

这一时期,“非洲电影之父”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塞姆班,安哥拉作家马里奥·平托·德·安德拉德,阿尔及利亚作家马利克·本·纳比等文化界人士相继访华。他们深受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创作了大量以中国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表达了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支持。

加纳作家科菲·阿沃诺在《黑鹰醒来》等诗篇中,赞颂中国民族独立和解放对非洲国家的鼓舞,以及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亲如手足的情谊。南非诗人丹尼斯·布鲁图斯在《中国诗抄》中将中国比作山水画,而撑起整幅画卷的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民。苏丹诗人阿赫迈德·穆罕默德·凯尔在诗作《献给你,中国》中高呼:“从前受苦受难的人们,如今找到了幸福和光明。亿万双眼睛在展望,通往远方的锦绣前程。”

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之外,中非高层间的密切互动也推动了中非友谊深入人心。先后13次访华的坦桑尼亚国父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在《尼雷尔文选》中写道,不同于殖民者以掠夺财富为目的修建铁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最真诚的帮助,“中国向我们展示了改革创

新和国之间相互团结的真正含义”。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条穿越莽莽草原、崇山峻岭、河谷盆地、丛林沼泽的铁路记录下岁月的痕迹,至今被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誉为“自由之路”。

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中国与非洲国家结下天然亲近的兄弟情谊。真挚的情感不仅促使双方通过文学创作彼此鼓舞,也推动着患难与共的中非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于是,真诚相助的兄弟、坚定不移的选择,成为20世纪非洲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形象。

当代发展之路上的携手共进

进入21世纪,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推进,中非团结发展之路愈加宽广,双方人民的心更近,情更深。非洲作家们越来越多地记录下亲眼所见的中非合作硕果,塑造出更加鲜活的中国形象。

菲利普·勒加在担任塞舌尔驻华大使期间,创作了多部展现中国形象的文学作品。《茉莉花蓝调》以浙江义乌的里美山村为背景,通过6个短篇故事讲述一代代村民对高尚品格的坚守,“茉莉花”的美好意象寄托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与向往。

阿尔及利亚作家艾敏·扎维于2008年先后访问北京、上海等城市,回国后有感于阿中关系的快速发展,在2015年出版长篇小说《女王》。小说讲述在阿工作的中国工程师余楚孙与当地女性萨库拉之间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质朴勤奋、尊重女性、有着强大精神支柱和文化自信的中国青年形象。

不断涌现的当代非洲文学中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与不断扩大的中非文学、文化交流密不可分。无论是中国作家前往非洲、非洲作家走进中国,还是文学研讨会、翻译工作坊的成功举办,都深化着双方对彼此文化的认知与理解。2024年,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青年诗人共赴中国,参加“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通过相互交流、共同创作,架起中非诗人间的心灵之桥。

以文化人,以艺通心。展望未来,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深入,中非文化交流活动将愈加频繁,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作家将继续以文会友,描绘相互尊重、携手发展的伙伴形象,共同书写让中非读者相互理解、生发共鸣的新时代精彩篇章。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

以上图片均为李春光提供



蒙城大口陶尊

见证中华文明源起

巩文 王吉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夏先民以智慧和勤劳创造了众多奇迹,陶就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造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内,收藏着一件件陶尊、陶盘和陶罐,直观展现了伴随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中国陶瓷发展史。通过了解陶器的刻纹、样式和功能的演变,人们能更深入认识先人的生活习俗、审美取向和精神世界,感受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走进中国考古博物馆常设展“文明起源”展厅,一件“大口尖底”的大型陶器单独陈列在展柜中,展柜四周是粗犷起伏的洞穴石壁,正上方刻着4个字:文明起源。这件备受关注的陶器名为大口陶尊,距今4800多年,陶器腹部刻画的符号是其最为独特之处。

文字雏形

大口陶尊,是夹砂灰褐陶,形体厚重,通体饰斜篮纹,腹部刻划一组符号,从上至下为“日、月、山”形。陶尊口径超过30厘米,高约60厘米。

1992年春季的一天,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常进行。突然,一个探方中传出振奋人心的喊声:“快来看啊,这里出宝贝了!”顿时,大家纷纷撂下手中的活,兴冲冲地跑过去,将探方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随着进一步清理,它的真面目逐渐清晰,原来是一尊大型陶器。当它完全展现眼前,一组规则的刻划符号引人注目,有的像一轮太阳,有的像一弯新月,还有的仿佛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尉迟寺遗址位于与苏、鲁、豫相邻的皖北地区,是淮河流域规模较大、保存较好、比较典型的一处含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堆积的新石器时代聚落。这里先后发掘出土7件带有刻划符号的大口陶尊,壁厚多在5—6厘米,重达25—30公斤,在当时是考古发掘的最大陶制品。大口陶尊上的类似符号在大汶口文化中多有发现,集中分布在山东莒县和安徽蒙城。

山东莒县和安徽蒙城相距近千里,然而,两地出土的大口陶尊无论是形状大小、壁的厚度,还是刻划符号的位置和用力程度都高度相似。通过岩相鉴定分析及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技术对两地出土的大口陶尊的矿物稀土元素及微结构等测试分析,两件器物均为在当地取土、烧制而成,出现相似性应该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研究人员认为,尉迟寺古人很可能从山东迁徙而来,同时带来文化传统,制作出具有原生地文化风格的陶器,并在此延续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现30余例有类似刻划符号的大口陶尊。除“日、月、山”形之外,刻划多种多样,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更展示出当时文明的发展程度。这些符号与殷商时期一些表意字非常接近,它们究竟是某种图腾族徽,还是对自然现象的抽象摹画,又或是古文字的雏形,目前学术界尚在探讨,但有一点已经成为共识:它加深了人们对中华文明源起的认知。

文字是人类的足迹。从5400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粘压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到5000年前古埃及人刻写在神庙石碑上的神文圣书,再到3300多年前古代中国人创造的甲骨文,文字推动了历史,也记录了历史。在中国的考古资料中,距今八九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有意识的刻划,开启了文字创造的先河。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双墩文化等,均铺设出以刻划符号为特征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通道。

陶制重器

带有刻划符号的大口陶尊是距今6300—45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制重器,制作如此大型的陶制器物,非少数人的短期之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制陶文明的发展程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的先民于1万多年前发明陶器,从最初简单粗陋的小罐、小钵,到器型稳定多样、装饰绚丽多姿的彩陶,再到技术精湛、工艺高超的“蛋壳陶”黑陶,及至印纹硬陶、釉

陶,直到瓷器诞生,陶器的起源与发展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见证。一部中国陶器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不断创新、连绵不绝的活态发展史。

应当说,陶器的发明源于实践需求,又不断发展创新应用于实践。随着环境变化、社会发展和技术成熟,陶器的形制和功能日趋多元复杂,各类陶器的不同组合形式日益丰富。仰韶文化半坡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庙底沟时期的花瓣纹彩陶、汝州阎村的花瓣纹彩陶、郑州大河村的彩陶双连壶、马家窑文化的人物舞蹈纹彩陶盆和陶寺文化的彩绘蟠龙纹陶盘等,这些中华大地不同地区先民创造出的代表器物都是时代的精品。从满天星斗到百川归海,它们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鲜明印迹。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目前已知最早的陶塑是发现于今天捷克境内格拉维特文化的小雕像,距今2万多年;最古老的陶制容器是2012年发现于中国江西仙人洞文化的陶器碎片,其年代可追溯至1万多年前……世界各地的先民们在陶器的发明、发展和利用上,贡献着各自的智慧。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与研究,世界范围内有6个早期陶器发明中心——中国南方、中国北方、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西亚和北非。陶器的发明,为人类饮食方式带来变革,促进人类文明快速发展,成为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文化史及科学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

陶器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随着人类文明演进不断发展。走过万年历程,从陶器到瓷器,从实用器到工艺品,今天的陶瓷在实用性之外兼具多样性、艺术性、审美性,其中既有陶瓷茶具承载的茶文化,也有艺术陶瓷传递的审美情趣。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国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陶瓷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生活、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

与友人闲坐喝茶品咖啡,与家人聚餐话家常,端起饭碗、放下茶杯,回眸万年前的一堆火,我们仿佛看见“陶”在熠熠生辉。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图为大口陶尊。中国考古博物馆供图

漫步格迪城址

丁雨

旅人心语

2024年,肯尼亚格迪古城遗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此前,我们曾到访格迪古城,整理格迪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

抵达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领略耶稣堡的雄浑沧桑之后,我们便匆匆北行百余公里,奔向格迪古城遗址。与赫赫有名的基尔瓦、马林迪、蒙巴萨不同,格迪古城少见于文献记载,就在100年前,它还不过是一片荒草遍地的废墟,寂寂无闻。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格迪才被重新发现。1948年,英国学者柯克曼主持了格迪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后续研究工作。这不仅是格迪遗址的首次正式考古工作,也揭开了东非斯瓦希里考古的序幕。格迪由此成为研究东非斯瓦希里历史不可绕过的标志性遗址。

“斯瓦希里”这四个字,似曾相识。它的原文“Swahili”是一个非洲班图人的词语,但它根植于阿拉伯语中的“Sahil”,有边缘和海岸的意思。斯瓦希里地区如今通常指代非洲东部,大致从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到莫桑比克的赤布尼一线绵延3000多公里的沿海地带。这一地区是大洋与大陆的交界地带,不同文化在此碰撞、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特色的海岸(斯瓦希里)人群和文化。格迪地处斯瓦希里地区的中心地带,代表了斯瓦希里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

步入格迪遗址,首先见到的是一块刻着铭文的阿拉伯碑刻。这块碑刻已经残破,但铭文中的日期内容幸运地被保留了下来。铭文以伊斯兰纪元记录了年代,相当于公元纪元的14世纪末15世纪初。这块饱经风霜、貌不惊人的碑刻,草蛇灰线般提示着格迪古城的年代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考古成果显示,格迪是一座兴建于12世纪、重建于15—16世纪、衰落于17世纪的古城。那块碑刻的年代,正处于

斯瓦希里文明加速发展、兴盛繁荣的时期。在欧洲人绕过好望角的前夜,14—15世纪的斯瓦希里人掌控着东南非洲黄金的出海口。基尔瓦、蒙巴萨、马林迪三大城邦激烈竞争又交相辉映,把斯瓦希里文明整体推向了辉煌的时代。身处“潮头”的格迪生机勃勃,这块非洲东海岸的碑刻属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提示着斯瓦希里文化中隐藏着的西亚文化要素。

格迪的宫殿区气势恢宏,被认为最能展现斯瓦希里高等级房屋的特色。宫殿区的建筑材料取自大海,那些坚固的石材均是珊瑚石,又以珊瑚灰浆粘合砌筑。在一些屋顶幸存的建筑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取自大海的红树林木材。将大海的馈赠运用于建筑营造中,是斯瓦希里人独有的创造。轻抚粗犷的珊瑚石墙,感受着来自几公里外的腥咸海风,酿成炎炎烈日下的一抹清凉。

格迪宫殿的内部结构极为复杂,功能区包括了各类庭院、房间、水井、集水坑、储藏室、厕所等等。有趣的是,遗址

中仍有不少区域以最富特色的出土物命名。而身处万里之外异乡的我们,意外邂逅了“故知”——“中国现金屋”。它意味着,在那个地点,出土了来自中国的古代钱币。

格迪曾出土大量中国遗物,除了钱币,还有陶瓷。在古代斯瓦希里社会,中国陶瓷是来自远方的珍奇,标志着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甚至具有通神的职能。正因如此,在格迪清真寺的礼拜堂周边、在宫殿旁的高等级柱基上,都曾经镶嵌有中国陶瓷,以昭示庄重与神圣。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格迪曾出土大量明初的龙泉青瓷——那是郑和航海时代的产品。它使我们不禁猜想,600年前,在斯瓦希里城邦鼎盛的时代,郑和船队是否也曾抵达过格迪?是否见证过这片遗址曾经的盛景?瓷片无声,却似乎已道尽一切。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rbgj@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